

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融合发展与再生性

陈绵水,冷树青

(九江学院 社会系统学研究所,江西 九江 332005)

摘 要: 地理环境是决定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而又缓慢发展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决定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性,封闭博大的地理环境有利于早熟的中华农业文明的独立与融合发展,由此进一步产生了地主制经济、儒家思想和宗法郡县制,三者间又高度互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殊自我调节功能的周期性再生结构。

关键词: 中华农业文明;地理条件;早熟;融合发展;“内外周期”;再生性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242(2010)02 - 0072 - 07

收稿日期: 2009-10-29

基金项目: 江西省 2009 年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人类社会系统跳跃型研究”(09ZX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绵水(1954 -),男,江西德安人,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冷树青(1962 -),男,江西武宁人,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所教授,博士。

中华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而又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它以华夏族为主体不断同化、融合周边少数民族,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东亚华夏文明圈,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学术界对中华农业文明的产生、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丰硕。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经历了 1928 - 1976 年的准备期、1977 - 1985 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 - 2000 年的全面展开期。2001 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主要成果是在学术界形成了对中华文明原生性与多元一体性的基本共识。^{[1][2]}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规律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它是如何长期延续的问题展开的。这一研究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为学术界高度关注和重视,有强调经济、政治、文化或地理环境一个方面的单因说,也有综合以上各种因素的多因说,后者又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形成共识,即肯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和外部社会条件对中华农业文明的发展具有共同作用。^{[2][145-169]}但物质生产的基础和决定作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它发展的进程中的

不同阶段亦有区别,而地理条件则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形成的重要因素。笔者考察的着力点即是立足中华农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具体深入地探讨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性、融合性与再生性特点,把握其缓慢发展和长期延续的内在规律。这无疑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古老文明的特点和演变规律的认识,并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它的未来发展。

一、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与融合发展

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苏秉琦认为,在距今 1 万年的中国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里程,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到中华一统的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其中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最早,在距今约 8000 年之时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在距今 5000 年之时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在距今 4000 年之时进入方国阶段;在距今 2000 年之时进入帝国时期。中原地区在距今约 6000 年之时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到距今四五千年之时,吸收北

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在距今 4000 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在距今 2000 年前秦统一六国进入帝国阶段。总之,中华文明具有超百万年的文化传统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之开端,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其中,古国阶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到距今四五千年之时它的这一特点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中华一统(即帝国)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固定下来,并不断得到加强。^{[1]163}

大体说来,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主要生产手段,并注意选育良种、兴修农田水利、施用粪肥,产生了精耕细作的集中化程度较高的定耕农业,特别是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男耕女织的家庭农业自然经济体制已经产生;而秦帝国的建立,完成了以领主制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制社会向宗法郡县制社会的过渡。地主制小农经济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根本标志,它使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在此基础上,中华农业文明以华夏族为主体不断同化、融合周边少数民族,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东亚华夏文明圈,成为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而又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它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

使中华农业文明出现独立、早熟而又融合发展现象的关键,是它所具有的优越的特殊地理条件。马克思指出,考察原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要“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为转移,^{[3]472}恩格斯进一步解释了世界不同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洲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4]34-35}自然环境对中华农业文明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

丰富充沛的农业资源孕育出早熟、发达的农耕文明。中华文明的农业资源十分丰富,可谓得天独厚,尤其是在文明的核心区——黄河流域。在距今 5000 年前,地球气候的最适期结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广大地区由湿润到干燥而导致的沙漠化使人们集中到大河流域,这是诞生农业文明的重要原因;而当时生产力发展受到了制约,这则成了世界农业文明最早产生并发展于能够开发的温带河谷平原地区的根源。大约在距今 4000 年左右,地球又在自然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气候日趋干燥而寒冷,几大古代文明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情况。但黄河文明并不存在类似其他文明的衰退现象,实际上在距今 4000 年之时正是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文明时代,是从“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文化开始逐步发展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文明时期。^{[5]40}

黄河文明是由特殊的气候、土壤和地貌条件所孕育而产生的。公元前 3000 年,虽然全球气候转向干燥,但东亚大陆当时的气候湿润度还是比现在高的。就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森林分布比现在多,特别是基岩山地和薄层黄土地区以林木为主。中国黄河流域大陆泽、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孟诸泽、荥泽、昭余祁、杨纆、焦获、逢泽等一大批湖泊的存在,使当时的气候普遍比现在湿润。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在距今 5000 年至 3000 年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均气温高于现在 20 左右,1 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 - 5 ,气候温和、降水充沛。^[6]湿润的气候为农作物更好地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黄河高原冲积平原,这片高原冲积平原的黄壤、壤土和下土坟垆粘着性不强,土质疏松。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含量较高,当时的人们在铁器农具出现前就开始了开垦耕种,农作物产量较高,这种情况在泾渭水和伊洛河及汾水、沁水等流域以及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地区最为典型。这一切都为黄河中下游农业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求得精神的寄托,文化随之产生;而共同生活在一条大河边文化群体,需要共同承担对大河的治理,因而要求有一个共同的管理形式和组织,国家由此产生。而南方气候温热,湖沼过于广阔,加上涂泥粘着性强,肥力不高,不易耕作,青黎色土柔和,但熟化程度不强。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对生产的制约性很强,故农业文明不可能在此首先发展。因此,中华文明首次出现在中

原地区,它是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传统为主体,以东西两大部落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传统的联盟为基础而形成的。黄河流域文明发端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延续历史之悠久都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文明不能比拟的。

(二) 封闭博大的地理环境

中华农业文明形成了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发展逻辑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即幅员辽阔的空间使得这种农耕文明能调节、可持续发展,而它独有的封闭的地理条件则为中华农业文明独立而自由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中华农业文明独立而自由地发展成为可能。中国东南面有大海、长白山和鸭绿江等;北面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黑龙江、阿尔泰山及沙漠等;西面和西南面则为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与横断山等;正南面也是大海等。因而与欧亚大陆大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不同,中华农业文明在历史上并未受到一次次游牧民族大规模迁徙及其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的影响,也未导致文明发展被迫中断的悲剧的发生。另一方面,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由于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其农业资源丰富、条件优越,即使存在周边少数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或冲击,其文明也能够自我调节和持续发展,乃至不断融合扩散,走向成熟。

从历史进程看,在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主要还只是在中原地区产生和发展。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游牧少数民族军队进入中原,迫使地主和农民大量南迁,地主制生产关系因而拓展到长江以南,入据北方的游牧少数民族也很快接受了更为先进的主制生产关系。因此,北方的经济虽因战乱暂时衰退,但不久就恢复了活力,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其统治地区也因入侵民族本身的农耕化而融合;而在南方,由于地主制生产关系的拓展,既扩大了它的支配地区,又使它增加了一定的活力。经过四五百年年的发展,中国地主制生产关系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形态。还未等它转入下坡路,又出现了北宋末年的第二次民族大迁徙,从而在空间上获得了更大的融合。此外,地主阶级利用政治权力为周边经济落后地区逐渐融合为一体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从未停止。

因此,在这个幅员广袤、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度中,早熟的中华先进农业文明自身的规模得到了不断发展。在繁荣上升期,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整个政治地域内仍有一定的扩展条件,在这一时期发达地区的高水平农耕文化向周边地区辐射;而在动乱衰落阶段,则出现了人口向偏僻地区的流亡、

扩散的现象,在这一时期农耕文化同样拓展着自身生存的空间,延长衰落的过程,从而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融合中形成了中华农业文明不断推进融合发展的长期性特点。这样,早熟的中华先进农业文明从黄河流域向北扩展到草原、大漠;向南扩展到海上;向东跨越黑龙江;向西北、西南越过巴蜀覆盖到青藏高原;并且这一文明还覆盖到朝鲜、越南、日本及东南亚等,从而像滚雪球一般,成为以多元一体、连续不断为宏观特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华夏文明圈。

(三) 地理条件与外部文明的影响

地理条件的突出作用还表现在中华农业文明与外部文明的关系上。源于地理条件的封闭性融合发展是相对于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而言的。所谓早熟,即中华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属于农业文明的高级阶段,这在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是远远未能达到的,因而它在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能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外部社会条件对它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不可能决定其发展方向的变化,恰恰相反的是夏变夷而非变于夷,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它对其他文明具有显著的同化作用。但是,这个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特定阶段产生的高度发达的东方农业文明,正是由于缺乏外部更先进文明的竞争互动,特别是中华农业文明自身封闭性缓慢发展的内在局限性,延缓了中华工业社会层次演进的发展进程,最终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自身生存的严重危机。

典型的反证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相对于大河流域农业文明后来居上的西欧农业文明却具有迥然不同的发展逻辑。西欧农业文明的发展程度远低于一些东方的农业文明国家,尤其逊色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水平。如西欧领主制封建经济发达,并且存在时间也较长,而地主制经济发展起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上,中国是地主制,是十分发达的集约化农业生产,而西欧则是封建领主制,仍处于粗放性农业生产阶段。前者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倍于后者。中国的工商业和城市也很发达。如11世纪末中国铁的年产量已达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年产量,人均产量更是比欧洲高出20%;13世纪中国福建西部的城市居民已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8%,这是18世纪末西欧尚未达到的水平。^{[7]169-70}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农业文明领先于西欧更无疑义。西欧的封建政治体制及封主与封臣的关系同中国西周时期封邦建国的政治体制和人身主从关系颇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出现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制和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在西方乃是近代

出现的事,而且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家甚至极力推崇儒学,以此作为批判基督教会的思想武器之一。^{[7]70}

因此,“如果说西欧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有某种关联的话,那只是西欧封建制度的落后,发展的不充分,为瓦解封建制度、导向资本主义的新的因素的发展留下空间。”^{[7]67}这种封建制或农业文明发展的不成熟,从社会系统哲学的角度看,具有一种典型的多元开放系统的特征,如西欧封建制政治是以分权和多元化为特征的。^[8]它有利于新的经济、政治力量的发展和崛起,有利于建立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基础上的自由城市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曾得到封建政权的扶持。而与中国农业经济的单一粮食种植结构不同的西欧农业与畜牧业混合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同样也容纳了更多的商品经济成分,这有利于西欧从农本经济向重商经济、市场经济的过渡,等等。^{[7]50}也就是说,西欧封建制使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之间缺乏稳定的协调与整合,因而易于解体,从而被新的社会结构或资本主义所取代。

同时,毋庸置疑,西欧封建社会所具有的外部条件对它的促进作用或西欧封建社会对其他地区更高层次农业文明发展成果(即以中华地主制农业文明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文明)的积极借鉴,则使其跳跃发展成为现实。众所周知,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中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阿拉伯文明本身就是对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波斯等的农业文明的综合并加以发扬而发展起来的,已经站在农业文明的较高阶段。另一方面,西欧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十分有利于向西欧自身传播先进的东方文明,如古希腊文明的传播,这使西欧的基督教文明从落后中逐渐苏醒过来;^{[9]385-387}还有中国四大发明在西方的传播。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0]427}而新航路的开辟、新世界的发现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使西欧人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能使西方文明产生跳跃转型的促进作用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正是因为以上内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使西欧封建制中断了向地主制社会的渐进转变,借助后发优势,即经过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等一系列嬗变,最终实现了对农业社会地主制的跳跃发展,率先跨入了工业社会。

二、再生性结构

通过进一步探讨发现,中华农业文明早熟发达、融合拓展、缓慢推进和长期延续的内在逻辑是,它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形成了由地主制经济、儒家思想和宗法郡县制三者的高度互补,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很强自我调节功能的“三位一体”超稳定的周期性再生结构。

(一)地主制经济

尽管中国的商品经济产生早,并且一度有较好的发展,如距今5000年的“龙山文化中的黑陶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且采用陶轮进行批量制作。至公元前两千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以红铜制品的出现为标志的金属冶炼加工业开始兴起。商代的青铜器冶铸更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无论是殷墟出土的钟鼎等器皿还是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面具都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到周代的冶铁业也蓬勃地开展起来,战国末期便创造了可锻铸铁和炼钢的技术,其生产规模和水平都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在纺织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商代已出现了麻布及丝织品,包括毛织的绢、提花的菱纹绮和刺绣,表现出高度发达的纺织技艺。此外,木器、漆器制作及制盐业等也都十分繁荣。”^{[11]44}商代末期,专业化商人已经出现。在商代的文物中,已有从最初的以物易物,发展到了以后的以海贝及计量铜块作为交换的媒介,而周代即开始出现了金属钱币。在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三晋、周、鲁、齐等地,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十分繁荣的通都大邑等。然而,一方面,须知秦统一以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社会尚处于封建制时期,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如政治上的周天子与封建诸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等,地主制经济、儒家思想和宗法郡县制的“三位一体”结构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早熟的农业文明决定了自足、封闭、稳定以及再生性极强的地主制小农经济必然成为物质生产的主导,多元的封建社会结构必然向大一统的一元宗法郡县制社会过渡。^[12]

物质生产上的地主制小农经济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逐步形成。这种基于家庭成员简单协作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和生活方式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它“把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劳动与生活劳动、户外劳动与户内劳动、主要劳动与辅助劳动等密切结合在一

起,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节省原材料和降低成本等。人的日常所需的最基本生活资料,如食物和衣物等都可以在家中生产,只有一些特殊物品如铁器、盐等要通过交换取得。家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微观社会经济结构细胞。^{[13]250}同时,这种小家庭经济尽管很脆弱,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往往难以生存,但正因其简单所以才极易重构,其结构和功能都易于维持,再生性很强。因此,只要这个构成传统社会经济细胞的微观结构及其功能不变,整个社会的性质也就决不会改变。

由特定地理环境决定的自足性、封闭性、稳定性以及再生性极强的地主制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系统周期性停滞发展的根本原因。因为,小农家庭内部的生产和分工强烈排斥社会分工,所以它是限制科技发明和应用、阻碍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枷锁;其高度的自给自足性和脆弱的经济力量——因为广大的自耕农等还得承受各种徭役赋税,难以扩大再生产,更不可能开辟新的生产领域,这使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商品需求与购买力极低,商品生产和交换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副产品和补充形式而存在。商品经济没有独立地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只能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挣扎。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14]623-624}

(二) 儒家思想

如果说早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基于家庭成员简单协作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地主制小农经济就已经确立,那么儒家思想在创造百家争鸣轴心文明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占主导地位,在群雄争霸中,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一个失意者。可是,百家争鸣为什么只有儒、墨、法和道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尤其是儒家更是其核心?这取决于中华农业文明的小农经济的特点。

中国当时的状况是,工商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城市居民结构的变化,但工商业者在经济上一直处于社会的最下层,虽然他们在经济上能成为富有者,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形成独立的市民阶级,政治地位较低,始终属于被排斥的阶层。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社会文化选择的主体力量。而作为百家争鸣的直接参与者的士,原

本也是贵族出身,他们从贵族、卿士或者平民中分化出来,在社会大动荡、“社稷无常奉”的贵贱移位中,代表的仍然是农本社会的思想意识。如儒家讲君主民之父母,法家亦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15]29}儒家说“工商众则国贫”,^{[16]富国篇第十}法家则谈“商贾技巧之人”,“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15]42}等等。先秦各家没有走向古希腊思想家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也未踏入印度思想家们厌弃人世、追求解脱之途,而是执著地进行着人间实用的世道探索。中国长期积累的农业小生产的经验是中国实用理性的哲学与科学文化能够顽强生存下来并得到很好保存的重要原因。^{[17]304}因此,百家争鸣,百川归海,先秦各家汇成了为地主制中央集权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文化保障的儒学。

同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进程看,也不可能有足以改变中华农业文明发展自身逻辑的其他外部社会的思想文化。非但如此,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农业文明,还由此开始了它巩固发展、融合扩散的新时期。这样,儒家思想经过先后吸收、融合名法、讖纬和道佛等,始终处于独尊地位。它上可以成为地主统治阶级“替天行道”的理论依据,中可以成为教化万民、维系社会的治国术,下还可成为修身养性的伦理手段。它强调“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这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哲学。“三纲五常”,从表面上看,其中除了君臣是政治关系外,其他都是家庭伦理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特点是伦理政治,国和家是相通的。“国家”乃是“家国”,“国”与“家”是融合的。故“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一张由亲缘关系为纽结而构成的等级化的庞大网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一切社会关系都具有一种连带责任,整体淹没了个体,道统专制扼杀了自由创造,等级体系泯灭了民主意识。儒家思想在“三位一体”封闭结构中发挥着自身特定的文化调节作用。

(三) 宗法郡县制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宗法郡县制。这种政治制度同样是建立在封闭性和再生性极强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家庭不仅是物质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同时还发挥着文化教育和政治统治等功能,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家长制,与君权至上的宗法郡县制具有内在的联系。“父权”上升为“君权”,将“孝”移为“忠”,这就形成家天下的绝对君权主义的政治统治。

宗法郡县制是在秦以前的宗法封建制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如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16]《儒效篇第八》其他异姓诸侯也多是与王族有亲戚关系之国。这样,家族内部大宗与小宗的血缘关系同国家的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结构;同时,类似的宗法关系也在各诸侯国内建立起来。秦统一后,宗法封建制逐渐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取代。系统的官僚组织在地方政治结构中建立起来。但一方面,仍是家国一体,皇室仍为一己私有,官僚组织自然也是奉行严格的等级体制,并遵循事君如事父的忠孝原则。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脆弱性,小农经济是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由家而形成的宗族亦具有重要的教化及社会控制与管理职能。在这个组织中,家族有权用家法族规约束宗室成员的行为,有的巨族大家甚至与地方乡官、乡绅相结合,从而建立更加强固的宗法统治体制。家族宗法成为地主阶级统治的重要基础。

这种宗法专制对维护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的长久发展具有高度的社会调节作用。就其维护小农经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而言,其作用之一是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制约。在浩瀚博达的中华文明中,各地区经济的差异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是十分突出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它的转化的媒介主要是赋税和地租,这就使商业和官吏、地方权势结为一体,加之受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和抑商政策的限制,因而入仕成为社会升迁的唯一途径。这样本来可以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多半转化为人们官场贿赂和购置地产的资金,交通、市场、税制和货币等商业手段就都首先成为了政治手段,从而中断了小农经济走向农商结合的通道。其作用之二是抑商政策的限制。如周制规定国君、夫人、世子、公卿、命妇皆不得往市场游观;商鞅提出了一整套“事本而抑末”的思想政策;秦国灭亡不久,便下令“上农除末”。汉代对商人采取“重租税”、“子孙不得为官”等措施;特别是汉代对老百姓除了采取一般税收和种种额外勒索的手段外,同时还实行为历朝统治者不断“发扬光大”的、由国家垄断的禁榷制(即盐铁专营)、官工制(即官办作坊和手工业工场,专门生产皇室用品,政府公用物品和军需品等)和土贡制度(即各地无偿贡献土特产)等,这更是极大地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

(四) 周期性再生性

不言而喻,由地主制经济、儒家思想和宗法郡县制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由于它的封闭性或内部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必然使其瓦解,但其高度

的“自我调节功能”却又使它具有一种特殊的超稳定性。这种特殊的超稳定性能够使它通过王朝的周期性兴衰得以再生和不断延续,即由自然地理条件所导致的地主制小农经济的再生性决定了一元地主制社会的长期周期性延续,亦如西欧自然地理条件导致商品经济的再生性决定其多元文明结构的跳跃性发展。^[8]

关于中华农业文明的周期性发展和长期延续,有关学者提出的“内周期”与“外周期”说对此给予了较好的概括。^[13]^[246-249]所谓“内周期”,是指尽管统治者采取种种政策、措施来维护自身的稳定,如抑制工商业和打击豪强等,但由于小农经济具有不可克服的脆弱性,特别是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不断兼并以及专制集权的不断加强,造成了自耕农递减和税收大量短缺,这种状况不仅难以避免而且逐渐加速,从而促使专制王朝走向衰落。当改良行不通的时候,历史便以暴力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便充当了改革家的遗嘱执行人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王朝循环,产生重新拥有土地的无数自耕农和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皇帝。当然,工商业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寄生性发展。这就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系统的生产力与土地占有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社会运行的“内周期”。

“外周期”,则是指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互动融合。它也体现出地理条件的特殊作用。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带,这里是农耕民族传统的聚居区和农业文明的发达地区。而在这一地区的北面,从东西伯利亚横跨亚欧大陆直到欧洲,连绵的森林草原和沙漠地带,为狩猎和游牧民族提供了广阔的牧场和狩猎场,其活动中心即是紧临中国北面的蒙古高原和中亚细亚地区。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经常越过中国北部山区南下中原进行掠夺,对农耕民族构成很大威胁,特别是在其专制王朝由盛转衰的发展时期,更会加速其周期性发展。其中突出的有西晋末年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两宋夏金辽时期、元灭金宋时期和明末时期游牧民族的入侵等,每一次大规模入侵,都导致一次经济社会文化的大滑坡,包括工商业的发展也会遭受挫折。而每一次下滑之后,经济又重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人口、农耕地带和农业文明也就又得到新的扩张,并不同程度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有所发展。这种由边缘地带游牧民族或外域游牧民族内迁和农业民族外迁形成的农耕区域不断扩大而产生的周期性运行,即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系统运行的“外周期”。

由宗法专制社会的内在矛盾造成的社会运行的内周期与外部游牧民族对定居农耕民族的间隔性入侵造成的外周期叠加,就形成了中国农业社会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与自然灾害的周期性循环相辅相成,体现为整个传统社会的治乱循环和王朝更替。概言之,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但促进了中华农业文明的早熟和独立融合发展,而且也为主制经济、儒家思想和宗法郡县制“三位一体”结构的周期性再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华农业文明的缓慢发展和长期延续,即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 [1] 朱乃诚.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2] 庞卓恒.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5]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3.
- [6]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中国科学,1973,(2).
- [7] 丁建弘.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 冷树青,夏莉芳. 试论后发文明系统跳跃转型的基本特征[J]. 求索,2009,(4).
- [9] 马克垚. 世界文明史:第1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2] 李苏琴,冷树青,等. 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 [13] 张琢,等. 发展社会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商秧,韩非. 商君书·韩非子[M]. 张觉,点校. 湖南:岳麓书社,2006.
- [1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7]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焦薇缜]

The Precocity, Fusional Development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HEN Mian-shui, LENG Shu-qing

(Social System Institute of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332005, Ji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 history, slow development and long-term extens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dvantaged agricultural resources determine the precocity of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the broad clos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independence, fu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precocity civilization, which further develops the cyclical regeneration of special self-regulation, arising from the host economy, the Confucianism and the patriarchal system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hich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recocity; fusional development; periodicity; regeneration